





接壤：  
校園內外的解殖教習

文 | 廉兮  
東華大學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副教授

## 引言

在資本主義全球化中，年輕一代要面對激烈競爭的就業市場和零碎片段的勞動條件。青年離鄉離農、飄泊他鄉，成為由資方主導的勞力市場上便宜好用的新血時，鄉村也面臨人口老化、偏鄉小校裁併校，社會貧富更趨兩極分化。

在台灣日益敗壞的勞動環境裏，學校如只談論提升競爭力，標榜訓練學生成為社會精英，則無異於強化新自由主義市場化與私有化的規訓和馴化。若兒童與少年的價值養成過程，是一個同化於資本主義經濟秩序，不斷貶抑與遺忘勞動人民史觀的教育歷程，我們的社會如何能發展抵抗新型態的殖民剝削，並關注共同生活的社會團結需要？在偏離現實、不能守護家園的教育制度裏，我們的青年將帶着怎樣的眼光，去認識自己與他人在這個世界裏的關係和作用？我們該如何看待和理解這塊土地上的共同歷史與生活經驗？

本章嘗試以大學教育工作者的角度，探討庶民主體的解殖教習可能空間。在庶民勞動、多元社區與家庭生活的視域中，構連庶民主體的歷史視域。在社會實質關係中，支持在地勞動的尊嚴，發展人民互助共生的情誼。以教育介入社會困局，在個體與群體的欲望接壤行動中，創造教育越界的公共抵抗陣地，走一條自內解殖的實踐之路。

## 陣地戰

我們目前正活在安東尼奧·葛蘭西（1971）所說的「陣地戰」——透過團結不同的社會運動，去反抗全球化資本主義的集體奮鬥——為

了展開他所稱的「游擊戰」：即是，協同努力來挑戰及轉化這種狀態，為社會創造一個替代的價值矩陣。陣地戰的一部分就發生在我們的校園裏。（Peter McLaren 2016，191頁）

2014年3月18日，黑色島國青年衝進台灣立法院，社運團體組織街頭論壇。318的前夕——3月5日，在台灣東部的大學教室裏，有一段大學生的課堂對話，為這場持久而艱難的反全球資本主義陣地戰揭開序曲。

### 「蘿蔔理論」——學生給我上的第一堂課

東華大學教育學院一門大一必修課由我教授，課名是「教育經典」。2014年，我選擇《學校敢勇於建立新的社會秩序嗎？》（喬治·科奧茲 George Counts 2014）和《伏流潛行：女性社運工作者練功手記》（張育華、王芳萍、拔耐·茹妮老王 2014）這兩本書作為閱讀與討論的材料。我計劃將社會重建的教育理論，連結到台灣的歷史和社會經驗，引導大學生看看來自不同家庭經濟條件、學歷背景與族群性別身份的青年們，如何參與由下而上的社會變革，共同發展具有勞動意識的草根民主力量。

開學第一周我集中介紹課程內容，也藉此初步認識系裏的大一新生。進入第二周，我以紀錄2001年《中國時報》裁撤中南部編輯中心，引發員工抗爭的紀錄片：《那一天，我丟了飯碗》，作為開啟社會想像的討論。我想藉着這部紀錄片讓學生從勞工的視角去看專業工作的職場處境，我帶着滿心期待大一學生所代表的青年理想主義色彩，設想影片會激起大學生對勞工受剝削的同仇敵愾，藉以反思學校教育缺乏勞動人權意識的討論。

紀錄片結束後，學生踴躍發言，但我漸漸感到頭皮發麻、如坐針氈。那個學期我的第一堂震撼教育是這樣開始的：

同學一：時代不同，過去是父權時代，現在是兩性平等時代。我不是那個時代的人，我沒有親身體驗，無法下定論。也許有些勞資不平等，但畢竟是過去了。希望現代不要再有這樣的事情。

同學二：勞資關係也是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的關係，是誰在壓榨誰也說不定。

同學三：假設勞方是賣體力，資方是買方，就像是買蘿蔔，如果有人不想買蘿蔔，那是買蘿蔔的人的錯嗎？人家不要買，你還一直要人家買，勞方太暴力了。

同學四：如果你用很低的價格買大量的蘿蔔，讓人過勞死的話，這樣對嗎？

同學五：企業應提出對勞方照顧的條件，但也不能因這群人無法工作就要求企業去養他們。

同學六：舉我媽的例子，她是銀行裏的小職員，朝九晚五地工作。她付出多少努力、就獲得多少回報。影片中沒有說勞工付出多少勞力來要求，買方沒有必要去養你，你是被裁員。事出必有因，那些勞工要拿出理由來證明你要養我！

學生的課堂發言延續到課後的心得筆記<sup>[1]</sup>，有些學生繼續以「蘿蔔理論」<sup>[2]</sup>支持購買服務的邏輯。我意識到學生課堂上的

- 
1. 學生於次周課堂作業中說明：「如果資方依照條文規定給予解聘金，待業期間之福利，我覺得是可被接受的，假如說你家晚餐習慣有蘿蔔上菜，而有一天，媽媽不想煮蘿蔔了，而買了別的菜，蘿蔔店的老闆就來你家門口說，你怎麼不買蘿蔔了！這樣我們這麼生活下去。這個問題可以移植到裁聘問題上，勞方賣勞力到勞力市場，資方則到勞力市場買取勞力，相對的，在商品市場，資方賣商品給消費者，消費者則到商品市場買商品。」
  2. 學生日後在課堂討論與作業書寫都開始互相引用該觀點，並稱之為「蘿蔔理論」。

觀點反映他們在資方主導的勞動市場中的關係與經驗。有一些學生慣了從管理者的角度分析文本與社會事件，也有一些來自勞動家庭的學生，扛着上大學的經濟壓力在校內外打工，即使知道被壓低薪資，但為了賺取學費與生活費，也只好接受大學街上的勞力市場現實。雖然他們很早就成為零售業職場達人，購買服務的邏輯也早進入他們的身體記憶裏，但《伏流潛行》中勞動者反抗的故事，召喚了這些學生重看自身的勞動經驗。女學生莉莉<sup>[3]</sup>寫下：

回想之前高中畢業的時候，我曾經到義美食品工廠打工，那是我第一次了解到原來賺錢是真的很不容易，面對在生產線上不間斷流動的各種食品，為了追求速度，員工的手不停歇的在生產線上工作，賺取辛勞的血汗錢。（學生閱讀筆記 2014年03月5日）

當同學們侃侃而談資方購買服務的正當性時，不擅辭令、來自勞動家庭的莉莉寫下她對階級抵抗的認識：

在還沒看這本書之前，面對勞工議題也是像作者一開始一樣，帶着一種旁觀者的角度看待，看到電視上的那些抗爭遊行，常常覺得這些抗爭似乎與我沒有太大的相關，也未曾設身處地仔細想想他們抗爭的原因，看完這本書之後，從中看見了勞工與資方之間的不對等的階級關係與資源的落差，例如：勞工法的知識背景，導致勞工時常遭到剝削壓榨。

……現在回頭看過去那一段「台灣錢淹腳目的」經濟輝煌的時代，除了看見表面上那些帶領台灣經濟起飛屬於管理階層的資本家那一群人，我更加由衷地佩服在那時代的努力辛勤工作的那一群底層勞工們，普遍的勞工意識尚未盛行之下，他們在面臨資方的各種要求以

---

3. 化名。

及對待，可以看見他們的地位是那麼地卑微不受尊重，但是他們的求生存的意志是那麼的堅韌，為了養活自己的家，在這樣的階級不對等的體制下努力掙一口飯吃，有人說台灣的經濟是這些中小型企業撐起的，我並不這麼認為，我會說——台灣的經濟是由底層勞工階級撐起的。如果沒有這群勞工，哪來的管理階層？（學生閱讀筆記：2014年03月23日）

「太陽花運動」擾動着大學課堂，在我和學生、學生與學生之間，都存在不同的社會想像，價值與立場的衝突也拉扯與牽動着彼此的神經。在全國媒體關注台北立法院的抗爭與變化時，課堂充斥着不同政治立場與觀點的攻防煙硝味。一些人批評學運青年目無法紀、製造社會對立，另一群學生支持改變，並到台北聲援學運、加入街頭論壇。

學期中我和東部環境運動團體與民間組織合作，在校內舉辦服貿論壇<sup>[4]</sup>。邀請國發會、花蓮縣政府政策承辦人員，以及經濟學者談自由貿易示範區（簡稱自經區）對現有農業的衝擊。民眾與師生討論花蓮如果設立自經區，可能會帶來怎樣的改變。論壇中探討了旅遊業、花蓮藝品店與民宿業的關係。學生也開始分享他們的經歷，例如大學街上經營學生餐飲的小店陸續關閉，新開的店家改賣玉石；大學生被房東終止合約，房東把房間租給經營陸客團的旅遊業者；同一棟大樓裏住着大學生和來來往往的陸客，彼此存在着巨大的社經文化距離。學期接近尾聲時，來自澳門的學生文新<sup>[5]</sup>寫下：

---

4. 【2014 花東論壇：花蓮自由經濟示範區——幸福經濟的機會與威脅？】

5. 化名。



眼見2004年澳門賭權開放至今，澳門生活指數不升反減，在過往都還沒開始買房子的人，至今已經買不起了。眼觀這十年來，人均收入大幅上升，但當中的大部分收入都掌握在有錢人手中，而中產階層收入卻不能應付生活所需，有人說寧願回到以前的澳門生活……在台灣的工人運動歷史下，澳門人又應如何爭取自己應有的權利？又如何為自己的將來出一分力？

學生結束了他們在大學的第一年課程，帶着一些對社會與自身與教育關係的認識前行。在系所課程的編制中，這門課是我接觸本系學生唯一的一門課。從既有課程結構來看，這不利於我和學生持續發展協作對話。但從大學學習的過程與目的來看，既然大學生不會把所有時間放在課堂學習上，那麼我和學生可以協作學習的地方也就不止於課堂之內了，大學校園內外都可以是教育實踐的現場。因此，在課程結構之外，去創造和學生接觸的教習空間顯得更為必要。

## 重返庶民自身的歷史與教育

「第三世界」這個概念，並不是一個文化範疇；而是一個由貧窮、剝削、屈辱與自輕所孵生出的政治與經濟範疇。這概念實是與為數眾多的人們所付出之努力密不可分地緊緊相連着——他們一代又一代，竭力在半極限的狀態下試着活下去……第三世界若要超過那些為它稱慶祝賀的人們進行的口號設計拼湊，只有一條路可以走：首先，是得通過成為世上每處和所有從前的人造苦難犧牲受害者的集體代表；其次，要通過把外頭的壓迫力量內在化、或承認擔下，然後以內在向量的方式來對付它；而最後，通過將第一與第二世界受壓迫或邊緣化的種種自身、認作這場對抗制度化了的苦難之戰役當中文明上的盟友。（阿席斯·南地 Ashis Nandy 2015，108–109頁）

台灣社會踩着農民與工人的背脊上發展經濟，教育無視階級剝削與歧視的社會關係，狹窄定位在階級翻身的功能。而受壓迫的勞動者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能脫離苦境。在資本主義餵養下的右翼政權中，左翼運動歷史的記憶空缺，勞動階級經驗被拿作反面教材<sup>[6]</sup>，勞動家庭經驗幾乎沒有另一種理解的可能。當前教育補償政策更指涉教育問題來自家庭功能不彰，貧窮家庭生活慣習，在這樣的想像中，成為需要被教育矯正與除去的印記。換句話說，社會階級的結構未曾改變，也不需改變。許多人相信教育可以改變人的生活，讓不同階級的人都有機會成為人生勝利組（成為壓迫者）。台商企業在海外攻城掠地，成為台灣社會裏白手起家、愛拼才會贏的英雄楷模，而失業者自殺只是社會新聞。失業勞工臥軌求償，還可以被秉持着「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信念的教師解釋為「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的人生失敗組佐證。教育作為階級分配的載體沒有受過強烈的質疑。

台灣在90年代開始的教改政策強調教育鬆綁、多元入學管道、適性發展，以及家長教育選擇權。偏鄉教育政策，以補救教學為主要訴求，所謂的教育機會均等，也不出增加弱勢者的競爭力，將其整合併入勞動市場為主要考量。雖然教育部提倡優質教育與師資，但是偏鄉小學遇缺不補，聘一年一聘的代理教師或鐘點代課補足，令教師高流動率成為偏鄉學校的常態。更有甚者，在台灣日益敗壞的勞動環境中，政府推動觀光業，花東土地隨之喊漲。當村落人口老化，地產業者收購土地與房產也加速進行。

---

6. 「如果你不好好念書，就送你去做工。」是許多人在童年常聽到的警語，在我的家庭裏也是。